研究論文

從統獨到中國因素：政治認同變動對投票行為的影響

吳介民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廖　美
紐約市立大學布魯克學院商業與政府研究中心

「中國因素」對台灣選舉政治的影響力，正在增加當中，使得存在已久之「國家認同分歧」，產生複雜的變化。中國因素通過經濟、政治、新聞媒體、文化等領域，滲透到台灣內部，可能正在改變台灣幾十年來的「統獨認知圖像」。本文使用中央研究院中國效應研究小組的中國效應問卷調查，發現在 2012 年總統選舉投票行為中，「中國因素」變項對「國家認同」選項，幾乎有取代的作用。據此，作者嘗試提出初步的詮釋架構，探討這些發現，對台灣政治與兩岸關係等研究可能帶來的重大意義。透過深究台灣選民態度的變化，也可以檢證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中，關於強國如何透過經貿依賴關係而影響弱國的國內政治之假設。十幾年來，中國政府利用台灣對其經貿依賴而試圖影響台灣的總統選舉結果；本文初步發現，中國因素可能正在影響台灣選民關於「國家認同」內涵的認知，並影響部分選民的投票行為。近年在台灣，階級政治似有浮現的趨勢；本文檢證發現，「階級投票」並不顯著，此發現不同於既有文獻，值得進一步探討。

關鍵詞：中國因素，九二共識，經貿依賴，投票行為，國家認同

台灣社會學第 29 期（2015 年 6 月），頁 89-132。
收稿：2015 年 1 月 20 日；接受：2015 年 6 月 25 日。

From Unification-Independence Divide to the China Factor: How Changing Political Identity Influences Voting Behavior

Jieh-min Wu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Mei Liao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Baruch Colleg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The "China factor" has increasingly penetrated Taiwan's electoral politics and is complicating the role that "national identity cleavage" has conventionally played in Taiwan. The China factor may have also caused a change in Taiwan's "unification-independence cognitive map" through its influence on politics, economy, news media and cultural sphere. Using the survey data collected by the China Impact Studies Group of the Academia Sinica, this paper found that i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2012, the "China factor" variables are likely replacing the fun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variables in a variety of contexts. We attempt to provide a preliminary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indings and attempt to substantiate the proposition that trade and economic dependence is the key factor in a regional power's ability to influence 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a small country. We foun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deed leveraged Taiwan's trade and economic dependence to intervene in Taiwanese elections, and the China factor has indirectly led to a number of subtle effects on Taiwanese voters' cogni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addition, there has emerged a new class politics in Taiwan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we found that "class voting" is not significant. This finding differs from other findings in the current literature on class politics and deserves further exploration.

Keywords: China Factor, 1992 Consensus, trade dependence, voting behavior, national identity

---

Taiwanese Sociology Number 29 (June 2015): 89-132

對長期觀察台灣政治的研究者而言，2012 年 1 月的總統選舉，有個明顯的議題特徵：兩岸經貿關係變成大選的焦點。在過去的總統選舉中，關於台灣的國家定位、主權、統獨等主題，往往在候選人之間激辯不休；但這次選舉活動卻異常平靜，國家認同紛爭幾乎不見蹤影，而出現一個未曾見過的景觀：數十個台灣企業集團負責人，在投票前幾週，以輪流召開記者會，或集體刊登報紙廣告的方式，「站出來」支持「九二共識」，讓兩岸經貿關係儼然成爲大選的決戰關鍵。

可以說，自 2008 年以來，「九二共識」是馬政府中國政策的基調。大陸觀光客大量來台，〈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 的簽訂與施行，都成爲馬政府宣傳的政績。馬英九也數度宣稱「九二共識」是兩岸協商的基礎，而民進黨則認爲「九二共識」並不存在。令人好奇的是，國民黨與企業集團在投票前幾週力挺九二共識時，民進黨的反駁力道似乎不大。一個可能原因是，民進黨反駁的聲音不被主流媒體報導；然而，卻不能說明在大選的關鍵，民進黨在兩岸關係政策上，沒有採取與國民黨正面對決的策略。參與此次總統選舉競選活動的一個民進黨幹部說：

> 這次選舉，我們不以兩岸政策做為攻擊議題，而是被動接招。中國方面，基於九二共識攻經貿方面的議題，而不是打主權議題……選前兩週，民進黨（蔡英文）的民調支持度明顯下降，但是下降的趨勢確實在選前大約三週就開始了。12 月 22 日，我們的民調還贏，但是 12 月 27 日就輸了 3%，選前 7 到 10 天，民調則拉開有 7-8% 的差距……我們選後做追蹤民調，問選民從蔡跳到馬的原因，其中一個主要因素是對兩岸經貿關係倒退的憂慮。[1]

這個談話內容指向兩個事實：第一，蔡英文的民調支持度在企業界還

1 訪談 201202。

沒有發動支持九二共識之前就已下滑，一直持續到投票前。第二，有一部分選民因爲擔憂兩岸經貿關係變化而改變支持對象。選後不久，有研究者發現，九二共識影響 6% 的選票（童振源、洪耀南 2012）；但也有民進黨人士認爲，九二共識不是影響大選結果的關鍵（林濁水 2012）。以上的矛盾訊息，是本文問題意識的出發點。此外，一篇經驗研究論文發現，支持「九二共識」、以及肯定 ECFA 經濟效應的選民，比較傾向投票給馬英九；而「台灣認同」確實未在此次選舉中發揮影響力（湯晏甄 2013）。最近一篇論文指出，九二共識的訊息傳播與接收方式，影響了一些選民的投票決定（林繼文 2014）。本文將深入探討這些經驗發現的政治意涵與理論意義。

十多年來，中國政府試圖干預台灣總統選舉的舉動未曾中斷。1996 年台灣首次總統直選，北京採取「武嚇」。之後歷次總統大選，中國也使用種種方法企圖積極干預。然而 2012 年選舉，是中方第一次大規模利用台灣企業家發言，有系統地操作「以商圍政」的「文攻」策略；而這個文攻策略的核心就是「九二共識」。

究竟選民對九二共識的態度與他（她）們的投票行爲之間，存在什麼樣的關係？過去關於台灣選舉行爲研究的文獻，通常涵蓋了國家認同、族群、所得、以及其他重要的人口變項（年齡、性別、教育程度等）。近年有研究指出，台灣的階級政治與階級選民有（重新）浮現的跡象（胡克威等 2010）。本研究將把這些傳統模型的因素都納入分析；但本文的主要目的則在：檢視「中國因素」是否在總統大選中扮演了關鍵的作用。換言之，作者在傳統解釋模型之外，將加入中國因素做爲檢定的變項，同時也分析在考慮中國因素後，階級因素是否仍然舉足輕重？

「中國因素」是一個框架概念，在本文論證中定義爲：中國政府運用資本與其他相關手段，對他國或境外地區從事經濟吸納，使其在經濟上依賴中國，進而方便執行政治目的。若將「中國因素」放在兩岸政經關係脈絡中，其作用機制常以下列模式進行：中國政府運用財政能力，給予某些台商特殊優惠（或「特別照顧」）而使之成爲「政

治代理人」或「在地協力者」；或運用中資、親中台商或跨海峽資本，在台灣進行採購，或企業的收購、入股、併購，並進而影響台灣的企業行爲、政府決策、媒體輿論、民眾態度、或政治秩序。透過上述作用，使中國（包括中共政府與中資與跨海峽資本）的影響力進入台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活各領域，讓中國因素引發效應。

在具體經驗操作層次，本研究檢定中國因素效應中兩個特定議題：(1) 具有政治與經濟性質的「九二共識」論述，與台灣選民的投票行爲有什麼樣的關聯？(2) 在目前兩岸經濟關係中，民眾是否獲得利益、是否擔心失業，與選民的投票行爲有什麼樣的關聯？

本文在方法上，將審視兩岸經貿之匯總統計資料，也對新聞媒體資料庫進行內容分析；同時運用問卷調查結果，檢證中國因素變項與總統選舉投票行爲之間的關係，並就調查發現詮釋其理論意義。章節安排如下：一、外國力量影響國內政策與選舉之相關文獻回顧；二、兩岸關係變遷與中國因素的浮現；三、分析本研究重要變項之描述統計；四、檢視傳統變數模型和中國因素變項與選民投票行爲的關聯；五、詮釋中國因素的選舉效應；六、結論。

一、外國力量影響國內政策與選舉的文獻回顧

大國或強國干預相對弱小國家的歷史久遠，干預的手段包括軍事、外交、政治、經濟等；選舉成爲現代國家主要的治理機制之後，介入選舉過程和結果，也成爲強國干預弱國的重要手段。在現代，「西方國家」介入他國選舉，著名的案例可追溯至〈巴黎和約〉(1856) 訂定後，英法兩國對摩達維亞 (Modalvia) 和瓦拉契亞 (Wallachia) 選舉活動的「積極觀察」。美國對其「後院」加勒比海地區和中美洲的選舉介入也是公開的秘密：在 1893 年到 1933 年之間，以及二戰之後，美國不僅在該地區「觀察」選舉，有時協助設計選舉過程，甚至派遣軍隊執行選舉 (Wright 1964)。1945 年簽訂的〈雅爾達密約〉一方面強

調「自由選舉」，另方面要求簽約國應向其他國家推展自由選舉，其中美國、英國和法國都積極介入歐洲國家的選舉，包括 1946 年的希臘、1948 年的義大利、和 1953 年的德國。

（一）西方國家的干預

西方國家不必然支持「選舉民主」。在冷戰時期，做爲「自由世界」霸權的美國，在其反共陣營內扶持威權政府、或漠視民主運動、或協助軍事政變或鎮壓，舉其犖犖大者，如對台灣蔣介石國民黨政權的支持、對南韓軍隊的「光州鎮壓」(1980) 開綠燈、中央情報局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暗中協助智利的皮諾契 (Augusto Pinochet) 以軍事政變推翻民選的阿葉德左派政府。反諷的是，「第三波民主」浪潮，外國力量也扮演一定的關鍵角色；而美國在冷戰結束前夕及其後的態度轉變也舉足輕重。例如智利在 1988 年，受制於國際壓力，皮諾契不得不將智利的政黨合法化，同時舉行公投；之後，皮諾契更於總統選舉中落敗。尼加拉瓜在國際社群中介下，以 1990 年大選爲基礎，達成國內兩派勢力的和平協定。蓋亞那共和國在 1992 年的選舉，也在外國壓力下，促使統治者開放多黨競選 (Kelley 2012)。冷戰結束後，西方國家在後共產主義國家和非洲國家，不遺餘力推動「自由選舉」；但有研究發現，如果沒有相對完備的民主體制，在經濟援助國家壓力下倉促進行選舉，可能造成不良結果，例如肯亞和盧安達的選舉，最後反而把國家暴力私有化 (Roessler 2005)。

長久以來，「經濟援助」都是西方國家對他國進行內政干預的一個槓桿，而這種槓桿作用也通過國際組織（例如歐盟和聯合國）來進行 (Leininger 2010)。雖然歐盟和聯合國都有促進他國民主進程的信念，卻不保證其援助可以帶來美好結果，因爲這些援助通常透過組織內成員與當地政治菁英合作，而政治菁英則把經濟援助拿來鞏固自身權力，民眾也因在選前得到經援，去支持特定政治菁英，造成徒有民主選舉形式，卻沒有深化民主體制。以海地爲例，過去 20 年曾兩度轉回獨裁政體（1991-1994 年和 2000-2005 年），國家不是處在動盪不

安中，就處在建立民主體制的「實驗中」，被視爲「邁向民主的無止境過渡」(Fatton 2002)。

（二）前蘇聯國家的轉型

冷戰結束之後，前蘇聯東歐與中亞地區的政治轉型，也處處可見外國影響的痕跡。在本世紀前 10 年，該地區都因出現總統和議會選舉不公，招致大批民眾湧上街頭抗議，結果造成政體轉型的「顏色革命」，例如喬治亞的玫瑰革命 (2003)、烏克蘭的橙色革命 (2004)、和吉爾吉斯 (Kyrgyzstan) 的鬱金香革命 (2005)。這個地區的「民主傳染」，讓俄羅斯高度緊張，因而試圖影響鄰近國家的選舉，促成一股威權體制的「回潮」。西方民主國家普遍認爲顏色革命的動力來自各國的國內勢力，俄羅斯則認爲起源於外國介入，把顏色革命看成西方國家在背後推動的政體轉換，藉喬治亞或烏克蘭的民主選舉，意圖削弱俄羅斯在該地區的影響。舉凡發生顏色革命的國家，都可觀察到若干「民主倒退」現象，包括革命領導者沒有實踐民主承諾，而這些結果則與俄羅斯的區域霸權有關。俄羅斯近年以「主權」民主 (“sovereign” democracy) 對比西方的選舉民主，提倡具有地區特色的民主，而非從西方國家直接移植而來，也對周邊國家鼓吹相同理念 (Khamzayeva 2012: 87-89)。後蘇聯中亞國家（包括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和土庫曼）在邁向自由民主體制過程，俄羅斯透過各式各樣計畫（有些是非意圖結果），使中亞國家不是持續、就是強化原有的威權特質，與俄羅斯的情況趨近；這些中亞國家都採取「形式的」民主制度，不容對權力進行有意義的抗爭，政權接班總被小團體壟斷 (Jackson 2010)。

俄羅斯在蘇聯解體後，經歷一段混亂時期，特別是葉爾欽領導期間。後來普丁掌權，推動經濟發展以鞏固國家權力，並對公民社會嚴控管壓；另一方面，在國際油價高漲期間，油藏豐富的俄羅斯能夠持續經濟成長，也帶來「政治穩定」，因而被稱爲「普丁模式」。俄羅斯以其經濟實力，說服或威嚇中亞鄰近諸國與其結盟國，遵循其發展

模式；此外，緣於語言、文化比西方國家更親近，中亞諸國與西方民主政體漸行漸遠，執政者也樂於仿效俄羅斯模式，加強威權統治。

（三）中國對其周邊的介入

相對強大的獨裁政權國家是否傾向推動鄰國成爲獨裁國家，或維持其獨裁狀態？最近的研究發現：中國對鄰國如柬埔寨和緬甸的政策，不只考量區域政治安全而加強結盟，也成爲柬埔寨和緬甸的最大投資國。中國支持柬埔寨洪森的軍事威權政體，大量投資柬埔寨內需建設，低價出售軍事武器，也給予經濟援助，試圖透過柬埔寨，保證中國海軍在泰國灣的通行權。在緬甸，中國則既支持緬甸軍政府，同樣也支持反抗軍，因爲兩者掌控的地區，都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藥材生產。2009 年，軍政府爲得到更多操控，對反抗軍發動攻擊，造成大量難民流入中國雲南邊界，影響雲南在緬甸的諸多投資與合作計畫。爲了不讓利益受損，中國給兩方——即軍政府和反抗軍——都提供停戰的經濟誘因 (Bader et al. 2010)。[2]

中國政府對台灣選舉干預的表面化，始自 1996 年的總統選舉。當年是台灣歷史上第一次總統直選，中國解放軍在台灣海峽舉行飛彈軍演，企圖干擾台灣選舉，局勢之緊張，使得美國派遣兩個航母戰鬥群前來，與解放軍形成對峙，瀕臨戰爭邊緣。台灣總統大選在區域戰爭一觸即發的壓力下順利舉辦，中美軍事對峙並未釀成戰火。此後，每次台灣總統大選都有北京干預的痕跡，到 2012 年大選期間，表現更是直接：數十個與中國有經濟利益關係的大企業集團負責人公開表態支持「九二共識」。此時，台灣對中國經貿依賴所導致的政治後果，已經相當明顯。

（四）經貿依賴與政治影響力

創造經貿依賴的結構關係，是大國影響小國的主要手段之一。這

2 最近幾年在美國介入下，緬甸軍政府放鬆政治控制，採取若干政治自由化措施，間接影響原先中國所獨占的影響力，西方國家的投資也開始進入緬甸。

種「政經策略」，政治經濟學家赫緒曼 (Albert Hirschman) 早在 1945 年出版的 *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 已經詳細分析：納粹德國將對富裕國家的貿易，轉移到規模較小、而且較不繁榮的鄰國，諸如保加利亞、匈牙利、羅馬尼亞等國，利用經濟、政治、和軍事上的優勢，對上述鄰國進行宰制 (Hirschman 1980[1945])。德國在「第三帝國」期間，處於全球大蕭條餘波，歷經劇烈震盪。一方面使用強制手段力保經濟穩定，挹注財政於大量基礎建設與建軍備戰；另一方面，以軍事力量爲後盾，擴張領土，迫害猶太人、反對者和其他少數族群，建立「極權主義體制」。比較不爲人知的是，第三帝國「元首」希特勒和他的統治機器，也善於操作靈活外交和「軟實力」，善於「做賠錢生意」，藉由犧牲短期利益，換取長期戰略目標。表面上的賠錢貿易，其實帶有戰略意涵。根據赫緒曼的研究，德國在第三帝國時代就曾執行「讓利」政策（包括交易價格優惠與採購保證），吸納周邊小國，專門生產德國所需物資（例如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或使之單邊依賴，而讓德國掌握「影響力槓桿」，在國際政治危機的時刻，強迫其接受德國的政策。在東南歐六小國中，保加利亞雖然深陷於依賴德國的貿易結構，卻善於與德國周旋，進而抗拒其影響力，但到 1941 年初，德國依然強迫其接受「三國和約」（德、義、日）。簽約翌日，德國軍隊即「應邀」進入保加利亞建立陣地 (Palmer 2010)。赫緒曼開創性的經貿依賴關係研究，提醒研究者與政治行動者注意大國經濟政策背後的外交與國際關係之戰略意圖。

自赫緒曼之後，關於國際間經貿與政治之間的關係，一個最重要的辯論來自「新自由主義制度論」對「現實主義論」（特別是「結構現實主義」）的挑戰：現實主義主張經貿關係無助於緩和國際間的衝突（最著名的例子爲一次大戰前英國與德國之間的貿易關係）；但新自由主義制度論則認爲，貿易關係有助於減緩衝突，因爲相互依賴關係 (interdependence) 使得國際間使用軍事衝突或脅迫手段解決爭議的成本大幅提高 (Copeland 1996; Morrow 1999)。倒是，國際間經貿關係經常出現的情況是「不對稱互賴」(asymmetrical interdependence)

(Keohane and Nye 1977)；部分現實主義論研究指出，不對稱依賴是權力的來源 (Knorr and Trager 1977)。

一些經驗研究顯示，美國與前蘇聯等強權利用經貿依賴關係，確實能使小國產生政治服從的效果 (Richardson and Kegley Jr. 1980; Roeder 1985)。然而，經貿依賴與政治影響力之間的因果關係可能更爲複雜，不能直接從經貿依賴之結構關係中導出，也不能簡單假設弱勢方必然做出政治讓步，而是要看雙方對政治目標的評估、各自的政權性質、各自內部國家社會關係等因素 (Wagner 1988)；其中一個可能的因果機制是：經貿依賴轉變了弱勢方的政治體制，因而使強勢方產生政治影響力，使弱勢方接受「被迫的共識」，而非純粹「屈從」(Moon 1985)。

中國崛起使其增加政治影響力，利用經貿實力影響周邊地區，並可能爭逐全球霸權 (Friedberg 2011; Subramanian 2011)。晚近，中國的「兩個韓國政策」(two-Koreas policy) 即備受關注 (Snyder 2009)。中國崛起是否必然導致它與美國的軍事衝突並全盤改變區域權力關係，學者之間仍爭論不定（Ikenberry 2008; Art 2010; 時殷弘 2015）。然則，中國崛起對兩岸關係之影響則顯而易見 (Bush 2013)。一份在 ECFA 協議簽訂前多年的研究認爲，中國並不因台灣對其依賴而能操作經濟槓桿 (Tung 2003)；然而，2010 年兩岸簽訂 ECFA 協議前後，對局勢的評估出現更多樣的視角，吳介民 (2009) 認爲「中國因素」正在侵蝕台灣民主；洪財隆 (2011) 從「政治化」的角度指出，兩岸經貿關係無法「正常化」的難題；林宗弘與胡克威 (2011) 則捕捉到兩岸經貿關係的緊密化對台灣階級投票行爲的可能影響。

上述辯論與本文題旨息息相關。然而，我們認爲，將國際關係理論運用於分析兩岸經貿關係如何影響政治互動時，應該特別注意兩個條件。第一，經貿互賴可能降低使用軍事武力的機率，但仍不能排除在互賴關係中，強勢的一方（中國）利用依賴關係做爲遂行其政治目標的槓桿（吳介民 2015）。第二，國際關係理論分析國家間關係，一個基本假設是互動的各造爲典型的主權國家。但是在兩岸關係中，台

灣雖然是事實上的主權國家，但其法理主權未被國際強權正式承認，而且其主權權力經常受到中國政府的挑戰。

根據以上文獻分析，我們把中國政府試圖影響台灣選舉的個案，放在當代世界政治史的比較視野上，進一步可發現幾個特徵。第一，當解放軍於 1996 年試圖阻撓台灣總統選舉時，台灣還在歷經關鍵性的民主轉型。到了 2012 年，台灣已經完成兩次政黨輪替，民主選舉制度已相對鞏固。因此，這是一個威權（後極權）國家對民主小國選舉的干預。第二，北京政府宣稱對台灣擁有領土主權，認爲台灣是其「尚未統一」的一省，主張其干預並非國際性質。第三，中國政府對台灣的干預手段，從「武嚇與文攻」（1996 年與 2000 年爲典型），轉爲運用經濟槓桿與兩岸政商關係爲主軸的「以商圍政」（2012 年爲典型）。而「以商圍政」策略的使用，必須以經貿依賴爲前提。近年，台灣對中國之經貿依賴已經相當高，下文將詳細探討。

二、兩岸關係變遷與中國因素的浮現

研究台灣政治的文獻，以政黨認同與政黨競爭、族群（省籍）、性別、國家認同或民族認同（包含統獨立場）、世代差異等議題爲旨趣的量化調查爲數不少。[3]然而，研究選民投票行爲的文獻，以中國因素做爲自變項的分析仍是少數（吳乃德 2005, 陳陸輝等 2009, 湯晏甄 2013）。一般統計模型的自變項主要是人口變項、族群、政黨認同、統獨立場等（盛杏湲 2002, 鄭夙芬 2009）。這類模型本文稱爲「傳統模型」。隨著「中國崛起」以及中國因素對台灣政治影響力的增加，我們假設傳統模型的解釋力將會出現限制。

---

3 政黨認同與政黨競爭的研究，參見吳乃德 (1993, 1999)，張傳賢、黃紀 (2011)，吳重禮、許文賓 (2003)，盛杏湲，陳義彥 (2003)，陳文俊 (2003)，蕭怡靖 (2009)；省籍族群研究，參見王甫昌 (1998)，吳乃德 (2002)；性別研究，參見楊婉瑩、劉嘉薇 (2009)；國族認同與統獨立場研究，參見張茂桂、吳忻怡 (1997)，陳義彥、陳陸輝 (2003)，陳陸輝、周應龍 (2004)，吳乃德 (2005)，沈筱綺 (2010)；世代差異與台灣民族主義的關聯，Rigger (2006)。

吳乃德在 2005 年出版的一篇論文中，就「中國因素」對國族認同產生的作用進行分析時，提出一組問題：「當中國不再落後，或甚至出現民主的可能性的時候，台灣民族主義將會有何變動？或者，一個對台灣的族群文化強烈認同的人，當他相信必須和中國統一，台灣的經濟才可能繼續發展的時候，他有多少可能性堅持其認同，犧牲麵包？有多大的可能性不顧麵包，而繼續保有他對台灣的『愛』？」(2005: 26-27) 吳乃德論文解釋的是讓台灣民族認同產生變動的因素，沒有涉及選民的投票行爲。這組調查資料距今已經十多年，在過去這段時間，中國的國力與兩岸經濟關係已經發生很大的變化，而且中國政府利用對台的經貿關係試圖行使政治影響也已行之多年，因此我們亟需根據新的現實情況，重新檢視這個論證，並探索其對投票行爲的影響。

（一）北京對台灣的政經影響力

中國因素對台灣的經濟政治影響力的增強，可從幾方面觀察。首先是中國經濟實力興起與兩岸經貿關係緊密化。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 (GDP) 在 2010 年超越日本，成爲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在兩岸經貿關係中，中國於 2005 年超越美國，成爲台灣最大的出口市場。2000 年，台灣對中國（包含香港）的出口額，佔出口總額 24.4%；2010 年升到 41.8%；2014 年爲 39.7%。對照而言，在 2000 年，中國（含港）對台灣的出口額，占出口總額 2.7%；2010 年爲 2.5%；2013 年爲 2.0%。[4]

再比較貿易依存度（即 trade-to-GDP ratio），20 年間，台灣對中國的貿易依存度也上升快速，達到顯著的水平，從 1992 年 8.0%，到 2000 年 13.8%，2011 年高達 34.9%。反觀中國，對台灣的貿易依存度則一直很低，1992 年爲 3.2%，2000 年爲 3.5%，2004-2005 年達到 4.7% 的高峰，之後則降回 2011 年的 2.5%（參見圖 1）。這組數字顯

4 台方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中方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 (2015)。港方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 (2012; 2014; 2015)。

示，中台兩方之相互的貿易依賴結構極爲不對稱；台灣已經形成對中國市場高度的出口依賴。反之，中國由於經濟規模遠大於台灣，貿易對象也較爲分散，因此對台灣的依存度極低。簡言之，兩岸的經濟權力不對稱現象，致使台灣在政治經濟變動下，顯得脆弱、而且易受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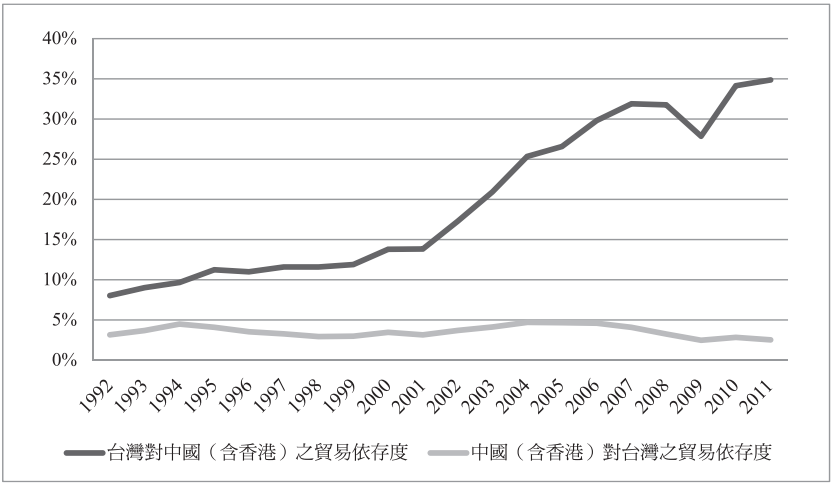

圖 1　台灣與中國相互之貿易依存度比較，1992-2011 年

資料來源：中國對台灣之貿易依存度以中方資料爲主，計算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http://www.stats.gov.cn/tjs/ndsi/，取用日期：2015 年 6 月 20 日）。台灣貿易依存度數據，計算自行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總體統計資料庫」（http://www.stadb.dgbas.tw/pxweb/dialog/satfile.asp，取用日期：2015 年 5 月 22 日）。

第二個觀察是，2008 年總統選舉期間，國民黨候選人提出「兩岸共同市場」政見，兩岸政策成爲競選的主題之一。針對 2008 年選舉，陳陸輝等人 (2009) 的研究指出：在兩岸經貿上主張開放及預期獲利者，傾向支持國民黨候選人；而其調查資料的統計檢定也支持此論點 (2009: 11-13)。這個研究明確檢測到中國因素與選民投票抉擇具有相關。中國因素的「麵包效應」，看來已在台灣的選舉競爭中顯現。

第三個觀察是，十多年來，中國政府對台灣政治的干預愈來愈明顯，是一個由外而內、從「武嚇」到兼具「經濟吸納」的變化過程，

最明顯的現象是民進黨在 2000 年執政後，中國發動一連串「九二共識」的文宣攻勢。在 2005 年，「國共合作」正式展開，連戰與胡錦濤聯合發表的公報亦明白列出：以「九二共識」推動兩岸關係。然而，根據國民黨的說法，國共雙方對於「九二共識」的內涵，各有不同的說法。國民黨政府對「九二共識」的內涵定義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簡稱「一中各表」。然而，中共從未同意「一中各表」，強調「『九二共識』就是 1992 年海協會與海基會達成的『各自以口頭的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中央社，2010）雖然國共雙方對「九二共識」內涵有爭議，但顯然並不妨礙雙方的「合作」。[5]

（二）九二共識：營造論述權力

進一步分析新聞媒體關於九二共識的報導密度。我們使用「聯合知識庫」[6] 與「中央通訊社」的資料庫，從 2000 年 1 月到 2013 年的 12 月，以「九二共識」爲關鍵字搜尋而得出的報導次數，匯總成爲季資料（每三個月爲一季），可以發現若干顯著趨勢。兩組資料呈現的密度也相當一致（參見圖 2）。「九二共識」這個名詞，出現在 2000 年 3 月總統大選之後，並開始在新聞媒體上浮現；報導次數的高峰，分別在 2001 年第 4 季，2005 年第 2 季，2008 年第 2 季，2012 年第 1 季。2001 年第 4 季出現小高峰，當時台灣幾個在野黨與中共接觸談及九二共識等議題，而在台灣國內執政的民進黨與在野黨之間也對九二共識問題針鋒相對。2004 年 3 月的總統大選，九二共識沒有成爲選戰文宣議題，耐人尋味。而 2005 年第二季，九二共識的報導出現另一波高峰，是因爲當時的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前一年競選總統落選）訪問北京，與胡錦濤會面並共同舉行記者會，發佈「公報」。此後，

---

5 關於國共兩黨以「九二共識」為基礎展開合作的來龍去脈，請參見吳介民，〈誰發明了『九二共識』？〉，收錄於吳介民 (2012: 99-110) 。

6 「聯合知識庫」，（http://www.lib.nthu.edu.tw/guide/cdrom/intro/udndata/ ）搜尋的範圍包括「聯合報系」在台灣發行的三份報紙：聯合報、經濟日報、和聯合晚報。

2008 年第 2 季與 2012 年第 1 季，背景都是總統大選，九二共識的報導都形成高峰，尤其從 2011 年下半年開始一直到 2012 年第 1 季，中央社的報導總計 551 則，而聯合報系高達 853 則，乃空前紀錄。「九二共識」做爲兩岸關係攻防戰的政治修辭，在最近這些年，似乎已經「內化」爲台灣選舉週期中的顯著事件，每逢總統大選前後便會被「動員」一次，成爲台灣政治的一部分；然而每次在總統大選後，報導的頻率立即大幅降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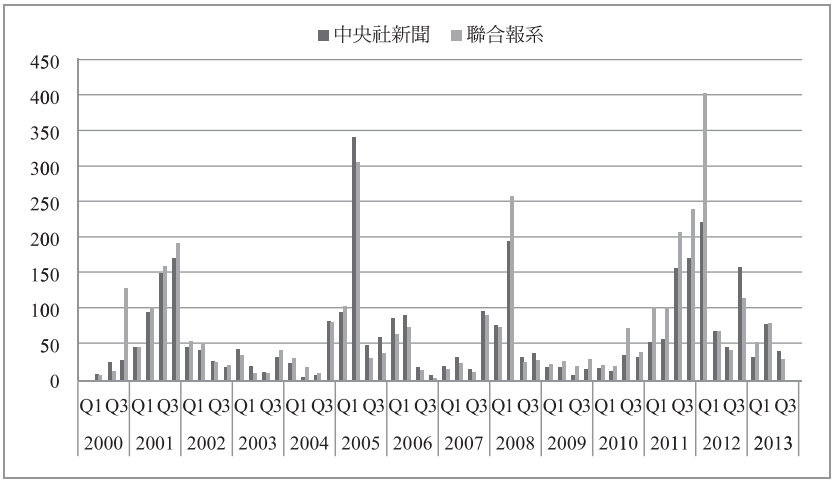

圖 2　九二共識報導頻率的趨勢，2000-2013 年（以季爲時間分析單位）

資料來源：計算自「中央社新聞資料庫」，以及「聯合知識庫」，(http://www.lib.nthu.edu.tw/guide/cdrom/intro/udndata/) 搜尋的範圍包括「聯合報系」在台灣發行的三份報紙：聯合報、經濟日報、和聯合晚報。

2015 年，台灣又開始進入總統選舉的熱季。九二共識再一次被用來做論述動員。5 月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到北京與中共主席習近平會面。會面中，朱立倫提及「兩岸同屬一中，但內涵、定義有所不同的九二共識」，並強調要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爭取台灣的國際空間（經濟日報 2015）；習近平則說，否認九二共識，挑戰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法理基礎，兩岸就不可能有和平（蘋果日報 2015）。「九二共識」在 2016 年總統選舉，是否可能重複 2012 年的角色？或者，「九二共識」將淡出選舉場域，而被其他論述或口號取代？這些問題值得密切

觀察。

（三）民眾關於國家認同的態度變化：2002-2012 年

以上鋪陳過去十幾年來，兩岸經濟關係的變化，以及中國政府試圖對台施展政治影響力。這段期間，台灣關於國家認同（國家定位）的民意如何變化？從 1990 年代開始，關於統獨立場的民意調查顯示，愈來愈多受訪者選擇「維持現狀」——非統非獨或傾向現實狀態的立場；同時，支持獨立者緩慢而穩定地增加，反之，堅持統一立場則持續減少。我們匯集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cy Study, TEDS) 歷年的調查資料，對照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中國效應研究小組 (The China Impact Studies Group, CIS) 的調查，發現類似的變化趨勢持續在最近十幾年之間發生。本文對國家認同態度的分類，採取「吳乃德分類法」並稍作修改，把傳統的「傾向統一」、「維持現狀」、「傾向獨立」（採用一個問題），更新分類爲「堅決統一」、「中間立場者」、「堅決獨立」（從兩個問題交叉得出結果）。詳細說明請見文末附錄 1。

表 1 整理十年來五次選舉調查中有關「統獨」立場的變化趨勢。前四次調查，是根據 TEDS 的選舉面訪資料，最後一次則爲 CIS 2012 年電話訪問資料。以 TEDS 四次調查爲例，「統獨」兩項選擇在表 1 最初兩次調查中，出現重大變化。在 2002 年時，「堅決獨立」爲 26.9%，「堅決統一」爲 25.2%，兩者旗鼓相當；中間立場者 33.7%。2004 年時，「堅決獨立」爲 33.5%，已經明顯高於「堅決統一」的 19.8%；中間立場者稍有增加，達到 36.3%。此後在 2008、2012 年，「堅決獨立」分別爲 40.2%，35.8%；對照而言，「堅決統一」則持續減少至 15.8%；同期間，「中間立場者」爲 34.3%，39.8%。值得注意的是，回答「其他」者（包括很難說、無意見、不知道與拒答等）也不斷減少，從 2002 年的 14.2%，減少到 2012 年的 8.6%，表示受訪者對於統獨議題愈來愈熟悉、或願意就此議題表示意見、或兩者兼有。CIS 的 2012 年調查採取電話訪談，結果顯示：「堅決獨立」爲 40.2%，

表 1：民意調查中統獨立場的態度分佈（單位：%）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TEDS*) 的調查				中國效應調查 (CIS)
	2002	2004	2008	2012	2012 **
調查期間	2002 年 1-4 月,第 5 屆立委選舉後	2004 年 6-9 月，第 11 屆總統選舉後	2008 年 6-8 月，第 12 屆總統選舉後	2012 年 1-3 月,第 13 屆總統選舉和第 8 屆立委選舉後	2012 年 2 月，第 13 屆總統選舉和第 8 屆立委選舉後
堅決獨立	26.9	33.5	40.2	35.8	40.2
堅決統一	25.2	19.8	15.8	15.8	14.2
中間立場者	33.7	36.3	34.3	39.8	39.4
其他***	14.2	10.5	9.7	8.6	6.2
總計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有效樣本數	**2022**	**1823**	**1905**	**1826**	**1202**

* 我們交叉分析 TEDS 兩題關於統獨的民意：(1)有人主張「如果台灣宣布獨立後，仍然可以和中共維持和平的關係，則台灣應該成為一個新國家」。請問，您同意還是不同意這種主張？(2)有人主張「如果大陸和台灣在經濟、社會、政治各方面的條件相當，則兩岸應該統一」。請問，您同意還是不同意這種主張？

** CIS 2012 年的資料來自雷同的詢問：(1)有人說：「如果台灣宣布獨立不會引起戰爭的話，台灣就應該宣布獨立。」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2)有人說：「如果中國大陸在經濟政治各方面的發展和台灣差不多，兩岸就應該統一。」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

*** 其他包含「很難說」、「看情形」、「無意見」、「不知道」及「拒答」。

資料來源：使用統計程式計算自以下兩個資料庫（樣本皆未加權）：(1)TEDS 資料來自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分別為「2001 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案(TEDS 2001)」，「2004 年總統選舉面訪案(TEDS 2004P)」，「2008 年總統選舉面訪案(TEDS 2008P)」，「2012 年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面訪案(TEDS 2012)」數據。(2)CIS 2012 資料來自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中國效應小組調查 2012 年。

「堅決統一」14.2%，「中間立場者」39.4%，「其他」6.2%。

CIS 2012 與 TEDS 2012 調查數據，在「堅決獨立」選項有些差距，但整體的意見分布結構仍是近似的。根據這一系列次調查，整體長期趨勢是選擇獨立者增加，選擇統一者減少。比較 TEDS 2008 和 TEDS 2012 兩次調查，就是在馬英九第一任總統任期，堅決獨立減少了 4.4%，堅決統一維持不變，中間立場者則增加 5.5%。以上中短期內，總體民意結構的變化趨勢，是單純反映台灣國內對於統獨選擇的態度變遷？或者，這個變遷過程中也摻雜了受訪者對中國因素效應的考量？本文的目標之一，在於探討中國因素（包括中國經濟吸引力所構成的「麵包效應」），是否與選民的投票抉擇有關聯。具體而言，我們將探討中國市場的吸引力，包括對受訪者個人的就業與家庭經濟生活等方面的影響，是否與其投票行爲有所關聯。

（四）兩岸經貿緊密化與階級政治命題

過去 20 年，台灣處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對於一般人的生計產生相當大的衝擊。兩岸經貿關係的緊密化，亦屬經濟全球化的一環。林宗弘與胡克威 (2011) 分析了近年來兩岸經貿政策下（ECFA 簽署後），不同階級對此政策的感受與反應。在新一輪的兩岸關係中，國家（族群）認同政治與階級政治的互動，是否存在新的模式？貿易利益的分配，可能對不同階級選民產生投票行爲的差異；而兩岸關係中的經貿政策是一個重要的測試指標。林宗弘與胡克威等人認爲，台灣有階級選民浮現的跡象。鄭盛隆在關於階級投票的研究指出，1990 年代的大部分全國性選舉，階級並非投票抉擇的顯著變項（只有 1992 年例外）；但在 2000 年的總統選舉與 2001 年的立委選舉中，明確出現了「階級投票」現象。他並推測：在 2000 年的總統選舉之後，階級因素已經發揮實質影響力，顯示台灣未來可能走向「階級政治」（鄭盛隆 2004）。前述論文試圖將階級政治帶回以政黨認同與統獨分歧爲中心的投票行爲研究。本文也將檢證：受訪者的階級因素是否與其投票行爲有關聯。

三、重要變項描述統計解析[7]

本論文使用的調查資料來自中央研究院「中國效應研究小組」所做的電話調查訪問，於 2012 年 2 月執行。本次調查實際訪問成功人數爲 1,202 人。回答總統選舉投票給宋楚瑜、林瑞雄這一組人數爲 43 人，比例爲 3.8%，因爲個案數太少，排除於分析模型中；同時，在排除不完全回答的受訪者後，進入分析的實際有效樣本是 1,035 人。以下是這個樣本的基本描述統計與交叉分析。

受訪者於總統選舉投票時，有 46.4% 表明支持馬英九，28.2% 支

7 對檢證本論文根據 CIS 資料所進行的統計分析有興趣者，歡迎向作者索取依據職業、公司大小、僱用或受僱身分對受訪者重新歸類的階級位置的 Excel 檔案，也歡迎索取所有描述統計、交叉分析和多元邏輯迴歸分析的所有程式。

持蔡英文，16.9% 沒有投票，另外合計 8.5% 表示「拒答」、「投廢票」或「不記得」（這個類別以拒答選項爲多數）。

政黨認同方面：37.4% 受訪者表示支持泛藍政黨（包括國民黨、親民黨、與中國新黨），19.4% 支持泛綠政黨（包括民進黨和台聯），而有 43.2% 沒有特定政黨支持。在此，我們把沒有特定政黨支持的受訪者稱爲「獨立選民」(independent voters)。

受訪者對於九二共識的看法：傾向支持者（包括很支持、還算支持）占 27.2%，傾向不支持者（包括很不支持、不太支持、懷疑九二共識內容爲何、認爲九二共識並不存在等選項）占 16.2%，表示中立的不確定立場者有 42.4%，不知道九二共識者（包括沒聽過、或者不清楚內容）占 14.1%。[8]

將總統投票行爲與對九二共識的態度進行交叉分析，可以發現：在支持九二共識的受訪者中，高達 84.8% 投給馬英九，只有 2.5% 投給蔡英文，6.4% 沒有投票，另有 6.4% 表示拒答等選項（參見表 2）。在不支持九二共識的受訪者中，有 7.1% 投給馬英九，66.1% 投給蔡英文，16.1% 沒有投票，另有 10.7% 選擇拒答或其他。從統計結果看

表 2：總統投票行為與對九二共識態度之交叉分析

	對九二共識態度									
	不支持		不確定		支持		不知道		總計（列）	
	N=	**%**	**N=**	**%**	**N=**	**%**	**N=**	**%**	**N=**	**%**
總統候選人										
馬吳	12	7.1	172	39.2	239	84.8	57	39.0	***480***	***46.4***
蔡蘇	111	66.1	135	30.8	7	2.5	39	26.7	***292***	***28.2***
不投票	27	16.1	92	21.0	18	6.4	38	26.0	***175***	***16.9***
其他*	18	10.7	40	9.1	18	6.4	12	8.2	***88***	***8.5***
總計（行）	***168***	***100.0***	***439***	***100.0***	***282***	***100.0***	***146***	***100.0***	**1,035**	**100.0**

* 大多數為拒答；Pearson chi2 (9)= 337.1926, Pr = 0.000

8 問卷題目是：關於「九二共識」的議題，請問您的態度是支持、不支持，或者中立。（回答支持、不支持者追問強度。）

來，支持與不支持九二共識者，面對總統選舉的抉擇可說壁壘分明；而且支持九二共識者的「凝聚力」似乎更強，會集中投票給馬英九；相對而言，雖然不支持九二共識者也有超過一半投給蔡英文，但在分配上相對分散，選擇不投票者也遠高於支持九二共識者。對九二共識表示不確定立場的受訪者，則表現出與前兩組人相當不同的選舉行爲：有 39.2% 投給馬英九，30.8% 投給蔡英文，21.0% 沒有投票，選擇拒答或其他的有 9.1%。

進一步交叉分析總統投票行爲與政黨認同發現：泛藍受訪者與泛綠受訪者，在總統選舉的投票行爲，如同對九二共識的態度，也是壁壘分明（參見表 3）。而在獨立選民部分，則有 28.9% 投給馬英九，24.4% 投給蔡英文，31.5% 沒投票，15.2% 表示拒答等選項。獨立選民的投票行爲模式，對比於泛藍與泛綠認同者，比較接近在九二共識表達「不確定」立場者。另外，獨立選民這個群體中，有 31.5% 沒投票，比例明顯高於樣本平均數的 16.9 %；而獨立選民表明拒答與其他選項者，也遠高於泛藍與泛綠支持者。

表 4 進一步探討獨立選民對九二共識的態度與總統投票行爲之間的關係。我們將受訪者中 447 位獨立選民單獨分析。在支持九二共識

表 3：總統投票行為與政黨認同之交叉分析

	政黨認同							
	泛藍		泛綠		獨立選民		總計（列）	
	N=	**%**	**N=**	**%**	**N=**	**%**	**N=**	**%**
總統候選人								
馬吳	348	89.9	3	1.5	129	28.9	***480***	***46.4***
蔡蘇	8	2.1	175	87.1	109	24.4	***292***	***28.2***
不投票	21	5.4	13	6.5	141	31.5	***175***	***16.9***
其他*	10	2.6	10	5.0	68	15.2	***88***	***8.5***
總計（行）	***387***	***100.0***	***201***	***100.0***	***447***	***100.0***	**1,035**	**100.0**

* 大多數為拒答；Pearson chi2（6）= 760.2928,　Pr = 0.000

者當中，有 57.6% 投給馬英九，7.6% 投給蔡英文，18.2% 沒有投票，16.7% 選擇拒答與其他。這組數字，如果跟全體受訪者支持九二共識者比較，可以發現：只要支持九二共識，便幾乎壓倒性地投票給馬英九；但在獨立選民當中，即使支持九二共識者，只有半數多一點投票給馬英九，與全體樣本相較減少 27.2% (=84.8-57.6)；而不投票者也明顯高於全體受訪者。至於，不支持九二共識者的獨立選民，有 6.9% 投

表 4：不同政黨認同選民之總統投票行為與九二共識態度交叉分析

	對九二共識態度									
	不支持		不確定		支持		不知道		總計（列）	
	N=	**%**	**N=**	**%**	**N=**	**%**	**N=**	**%**	**N=**	**%**
(A) 泛藍選民										
總統候選人										
馬吳	7	77.8	106	82.8	200	94.3	35	92.1	***348***	***89.9***
蔡蘇	1	11.1	7	5.5	0	0.0	0	0.0	***8***	***2.1***
不投票	1	11.1	11	8.6	6	2.8	3	7.9	***21***	***5.4***
其他*	0	0.0	4	3.1	6	2.8	0	0.0	***10***	***2.6***
總計（行）	***9***	***100.0***	***128***	***100.0***	***212***	***100.0***	***38***	***100.0***	**387**	**100.0**
(B) 泛綠選民										
總統候選人										
馬吳	0	0.0	2	2.2	1	25.0	0	0.0	***3***	***1.5***
蔡蘇	78	89.7	79	85.9	2	50.0	16	88.9	***175***	***87.1***
不投票	3	3.5	9	9.8	0	0.0	1	5.6	***13***	***6.5***
其他*	6	6.9	2	2.2	1	25.0	1	5.6	***10***	***5.0***
總計（行）	***87***	***100.0***	***92***	***100.0***	***4***	***100.0***	***18***	***100.0***	**201**	**100.0**
(C) 獨立選民										
總統候選人										
馬吳	5	6.9	64	29.2	38	57.6	22	24.4	***129***	***28.9***
蔡蘇	32	44.4	49	22.4	5	7.6	23	25.6	***109***	***24.4***
不投票	23	31.9	72	32.9	12	18.2	34	37.8	***141***	***31.5***
其他*	12	16.7	34	15.5	11	16.7	11	12.2	***68***	***15.2***
總計（行）	***72***	***100.0***	***219***	***100.0***	***66***	***100.0***	***90***	***100.0***	**447**	**100.0**

* 大多數為拒答。交叉分析顯著性檢定：(A) 為 Pearson chi2 (9) = 24.61, Pr = 0.003；(B) 為 Pearson chi2 (9) = 25.79, Pr = 0.002；(C) 為 Pearson chi2 (9) = 57.11, Pr = 0.000

給馬英九，44.4% 投給蔡英文，31.9% 不投票，16.7% 表示拒答與其他選項。如果跟全體受訪者中不支持九二共識者比較，可以發現：不支持九二共識者，有超過半數會投給蔡英文；但在獨立選民中，下降了 21.7%。這些統計顯示，獨立選民不管表達支持或不支持九二共識，他（她）們的投票行爲相應也有偏藍或偏綠的傾向，但是不像全體受訪者那樣涇渭分明。再看獨立選民對九二共識採取不確定態度者：有 29.2% 投給馬英九，22.4% 投給蔡英文，32.9% 沒有投票，15.5% 選擇拒答等。如果跟表 2 全體受訪者中對九二共識表示不確定態度者相較，可以發現：投給馬英九者下降 10%，投給蔡英文者下降 8.4%，不投票者增加 11.9%。

整體而言，獨立選民針對九二共識的態度，有 14.8% 傾向支持，有 16.1% 傾向不支持，有 49.0% 表示「不確定」立場。與全體受訪者比較發現：獨立選民除了大多數表示不確定立場之外，對九二共識的支持也明顯偏低。相對而言，泛藍政黨認同者，有 54.8% 傾向支持九二共識，有 33.1% 立場不確定，只有 2.3% 傾向不支持；而泛綠政黨認同者，有 43.3% 不支持九二共識，45.5% 沒有確定立場，只有 2.0% 支持。至於「不知道」九二共識爲何者，從泛藍、泛綠到獨立選民，所占組內的百分比分別爲 9.8%， 9.0% 和 20.1%；可見，獨立選民對九二共識的認知度（或關照度）比特定政黨支持者低很多。

綜合以上數字，可以得出幾個暫時性的結論：

(1) 對九二共識有明顯立場者（支持或不支持），與投票行爲（投票給馬英九或蔡英文）有高度相關。

(2) 對九二共識有明顯立場者（支持或不支持），也與政黨認同（泛藍或泛綠）有高度相關。

(3) 雖然藍綠政黨認同者在「九二共識」態度上各擁壁壘；但獨立選民不支持九二共識者，則稍微多於支持九二共識者（即 16.1 比 14.8）。

四、檢定階級、傳統模型、與中國因素變項

以上關於總統投票、九二共識與政黨認同的描述性統計，給我們一個大略的輪廓。本節將運用多元邏輯迴歸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檢定影響總統投票行爲的諸多可能因素。模型 1 檢定階級與總統投票行爲的相關度。模型 2 除了階級變項外，再加上解釋台灣投票行爲的「傳統變項」，包括政黨認同、統獨選擇、族群、所得、以及其他重要的人口變項（例如年齡、性別、教育程度等等）。模型 3 在控制階級與傳統模型變項後，添加中國因素，進一步觀察中國因素對投票行爲的效應。當然，在進行模型建立前，我們也一一檢查主要變項之間，有沒有共線 (multicollinearity) 存在，其中包含政黨認同、國家認同（統獨選擇）和「九二共識」等變項；結果顯示，這些變項間並沒有共線情形。

（一）檢定階級變項（模型 1）

本文將階級分爲 7 類階級位置 (class position)，包括資本雇主、小企業雇主、軍公教、專業者與管理階級、自僱者、勞工階級、農民。[9] 這個分類先根據 John Goldthorpe 等人發展出來的 EGP11 分類法，簡化爲 6 分類 (Breen, 2005; Bergman and Joye, 2005)；考慮台灣政治經濟脈絡中，「軍公教」人員是一個相當特殊的政經群體，因此從中抽出歸爲一類，再加上「非勞動力」（主要包括家庭主婦、學生、及退休者）爲一類，在統計分析時總計有 8 類，我們以「勞工階級」做爲參考組。這個分類法也受到新馬克思主義方法中關於所有權與生產資料之觀點的影響。

---

9 資本雇主是指僱用勞工人數超過（包含）30 人的企業雇主。小企業雇主是指僱用 5 到 29 名勞工的雇主。自僱者是指僱用 4 名勞工以下或沒有僱用勞工的自營作業主。勞工階級包括藍領勞工與白領勞工。農民包括自耕農與僱用農工的農場經營者。

模型 1 檢定階級與總統投票行爲的相關，我們又分出 (A) 型與 (B) 型。當從事多元邏輯迴歸分析時，(A) 型以「不投票者」爲比較基準 (base outcome)，著重特定政黨支持者相對「不投票者」的階級比較；(B) 型則以「投票給蔡蘇者」爲基準，即以泛綠選民相較，旨在對照出泛藍選民的階級特性。以下詳述 (A) 型與 (B) 型的分析結果。

模型 1 (A)：當依變項（總統投票給哪一組候選人）以「不投票者」作爲比較基準，自變項以「勞工階級」作爲參考組 (reference group)，預測投票給馬吳的受訪者，有 3 類階級在統計上呈顯著相關 ($p<0.05$)：軍公教、專業者管理階級、與非勞動力；其中，小企業雇主也有一定顯著度 ($p<0.1$)。從迴歸分析結果，軍公教和專業者與管理階級投票給馬吳的「相對支持率」（relative risk ratio, 簡稱 RRR）都是勞工階級的 2.3 倍；而非勞動力投票給馬英九的相對支持率則是勞工階級的 1.9 倍。（相關數據請參考表 5，下同。）

再以模型 1 (A) 預測投票給蔡蘇者，只有小企業雇主在統計上顯著 ($p<0.05$)，而非勞動力階級僅達一定顯著度 ($p<0.1$)。小企業雇主階級投給蔡蘇相對於勞工階級投給蔡蘇是 3.6 倍。與上述預測投票給馬吳相比，小企業雇主階級對馬吳的支持相對低於對蔡蘇的支持。

模型 1 (B)：換以「投票給蔡蘇者」爲比較基準。也就是，如想知道階級因素在預測馬吳（藍營）相對於蔡蘇（綠營）支持度上的差異，可把依變項中蔡蘇這組當比較基準，同樣以勞工階級做參考組。當觀察模型中的統計顯著度，只有軍公教接近一定的顯著水準，其中 p 值是 0.107（RRR 值爲 1.62）；其餘各階級組別在統計上都不顯著。這表示，我們沒有辦法推論：馬吳與蔡蘇兩組候選人在階級上的相對支持率有明顯差異。此外，這個模型的 Pseudo $R^2 = 0.012$，數值相當小，表示階級變數對模型的解釋力相當有限。

直觀上，雖然某些階級群體對預測總統大選投票行爲有一定作用；但從檢定結果來看，的確很難論斷，藍綠選民在階級方面，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表 5：特定顯著變項對投票給各組候選人的相對支持率（RRR 值）比較

	模型 1 (A)[a]	模型 1 (B)[a]	模型 2[b]（傳統模型）	模型 3[c]（中國因素模型）
	依變項的比較基準是「不投票者」	依變項的比較基準是「投票給蔡蘇者」		
依變項：投票給蔡蘇				
階級				
軍公教	1.45			
資本雇主	0.80			
小企業雇主	**3.58** *			
專業者與管理階級	1.53			
自僱者	1.31			
農民	1.85			
非勞動力	**1.56** +			
依變項：投票給馬吳				
階級				
軍公教	**2.34** *	1.62	0.80	0.73
資本雇主	0.80	1.01	1.33	0.87
小企業雇主	**2.68** +	0.75	0.54	**0.34** +
專業者與管理階級	**2.26** *	1.47	1.08	0.99
自僱者	1.18	0.90	0.78	0.72
農民	0.71	0.39	0.31	0.20
非勞動力	**1.87** **	1.20	0.98	0.98
政黨認同				
泛藍認同			**28.19** ***	**18.53** ***
泛綠認同			**0.01** ***	**0.02** ***
統獨選擇				
堅決統一			**2.76** *	1.98
堅決獨立			**0.59** *	0.93
省籍				
外省人			**7.15** ***	**5.68** ***
女性			**1.64** *	**1.62** +
中國因素				
支持九二共識				**6.20** ***
不支持九二共識				**0.21** ***
不知道有九二共識				1.03
擔心失業				**0.39** ***
有助家庭經濟				1.76
沒影響家庭經濟				1.21
N=	1035	1035	1035	1035
Pseudo R-squared	0.012	0.012	0.356	0.390
Log likelihood	-1251.26	-1251.26	-815.34	-772.06

[a] 以勞工階級為參考組。

[b] 階級變項處理如 a)。其他各變項的參考組分別是：在政黨認同是獨立選民，統獨選擇是中間立場者，省籍是閩南人，教育為國中以下。本模型也控制年齡和收入；兩者均為連續變項。由於年齡、收入與教育程度在模型中均不顯著，在本表沒有列出。

[c] 本模型的變項處理如 b)；而與中國因素相關的三個變項，其參考組分別是對九二共識態度不確定，不擔心失業，與認為對家庭經濟有負面影響者。同樣的，由於年齡、收入與教育程度在模型中均不顯著，為了讓表格簡潔，在本表沒有列出。

統計顯著水準：+ p≤0.1, * p≤0.05, ** p≤0.01, *** p≤0.001。

（二）檢定傳統模型（模型 2 ）

模型 2：此模型檢定的自變項除了階級以外，再加上政黨認同（泛藍、泛綠、獨立選民）、統獨選擇（堅決統一、堅決獨立、中間立場者）、族群（閩南、客家、外省、原住民族）、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和收入等。依變項（總統投票給哪一組）以蔡蘇作比較基準 (base outcome)。在預測投票給馬吳的受訪者中，階級變項完全不具統計顯著性。在性別方面，女性較男性支持馬吳（RRR 值是 1.64）。族群方面，我們以閩南人作爲參考組，外省人支持馬吳的情況非常顯著 (p=0.000)，RRR 值達到 7.15。統獨變項以中間立場者做參考組，不管堅決統一或堅決獨立，統計上都達顯著水準：前者傾向支持馬吳 (RRR=2.76)，後者傾向不支持 (RRR=0.59)。在政黨認同方面，我們以獨立選民爲參考組，認同藍營者投票給馬吳的相對支持率，是獨立選民的 28.18 倍 (p=0.000)；而認同綠營者則極不可能投票給馬吳 (p=0,000; RRR=0.01)。在這個模型中，年齡、教育程度、與收入在統計上都不顯著。

本模型的檢測結果，與過去一些研究發現基本吻合。例如，盛杏湲對 1994-2000 年間，五次全國性選舉的分析顯示：在統計上，政黨偏好、省籍、統獨立場大部分都是顯著的，其中，實質影響力最高的是政黨偏好（盛杏湲 2002: 60，表 5）。鄭夙芬 (2009) 的研究雖然指出政黨偏好與「台灣意識（台灣認同）」的重要性，卻宣稱省籍的作用不顯著；但仔細閱讀其迴歸模型（2009: 38，表 5），在她分析的四次總統選舉中，有兩次（2000 年與 2008 年）省籍變項在統計上相當顯著，雖然迴歸係數低於政黨偏好與台灣意識。簡言之，運用近似的變項（本文稱「傳統模型」），本研究的發現與上述研究發現雷同。

（三）檢定中國因素變項（模型 3 ）

模型 3：建立在模型 2 的基礎，我們在模型 3 加進中國因素的變項。依變項（總統投票給哪一組）仍以蔡蘇作比較基準。在此模型中，我們同時加入 3 個自變項：即「對九二共識態度」、「在兩岸經

濟關係下，擔不擔心失業」[10]、和「兩岸經濟關係對家庭經濟的幫助」。[11]當加入中國因素的變項後，模型 3 的統計結果，呈現幾個重點：

第一，統獨選擇變項的顯著度產生很大變化。同樣以中間立場者做參考組，不管堅決統一者或堅決獨立者在統計上都變得不顯著，此處統獨因素對投票行爲的影響遠比模型 2 小。

第二，政黨認同仍是相當關鍵的解釋因素，雖然在模型中的預測力道下降。投票給馬吳的受訪者中，認同藍營者投給馬吳的相對支持率是獨立選民的 18.53 倍 (p=0.000)；而模型 2 是 28.19 倍。

第三，在階級變項方面，只有小企業雇主階級呈現一定的統計顯著 (p=0.098)；RRR 值是 0.34；表示小企業雇主相對於勞工階級，對蔡蘇的支持度還是高於馬吳。除此之外，其他階級組別在統計上都不顯著。

第四，至於族群變項，外省人顯著支持馬吳，RRR 值是 5.68 (p=0.001)，比模型 2 稍微降低。

第五，性別方面，女性相對於男性顯著支持馬吳，RRR 值是 1.62 (p=0.068)，與模型 2 相近。

在概述模型 3 控制變項所產生的效應後，以下，我們進一步分析中國因素在這個模型中的影響力：

第一，「九二共識態度」對投票行爲影響顯著。在預測投票給馬吳的受訪者中，投給馬吳的相對支持率，支持九二共識者是不確定立場者的 6.20 倍 (p=0.000)。而不支持九二共識者，投給馬吳的相對支持率，是不確定立場者的 0.21 倍 (p=0.001)。換言之，支持九二共識者強烈支持馬吳，而不

10 問卷題目是：「請問，最近兩岸經濟關係的發展下，您會不會擔心失業？（先問態度，再問強度。）」

11 問卷題目是：「請問，您認為目前為止兩岸經濟關係的發展，對您家庭的經濟狀況是有幫助、或是有負面影響？（先問態度，再問強度。）」

支持九二共識者非常不支持馬吳。

第二，「在兩岸經濟關係下，擔不擔心失業？」這個變項在統計上也極爲顯著。在預測投票給馬吳的受訪者中，投票給馬吳的相對支持率，擔心失業者是不擔心失業者的 0.39 倍 (p=0.001)。換言之，擔心失業者傾向不支持馬吳。

第三，至於「兩岸經濟關係對家庭經濟幫助」的變項，在統計上不顯著，不能確定這個因素是否對受訪者的投票選擇產生作用。

爲了剖析階級變項對整體模型的影響力，我們做了進一步的統計檢測。原本模型 1 只檢定階級變項，其中 Pseudo R^2=0.012；模型 3 中包含階級變項時，Pseudo R^2=0.390；但當我們去除階級變項，Pseudo R^2=0.383，表示階級變項對模型 3 的貢獻微乎其微。可見，在實證分析模型中，有沒有放入階級變項，並不影響預測的結果。

表 5 列出上述三個模型的相關數值。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變化乃從模型 2 到模型 3 ，當加入中國因素變項後，統獨變項在統計上完全不顯著，不管「堅決統一」或「堅決獨立」的變項都一樣。

五、詮釋中國因素的選舉效應

本節就上述統計發現，詮釋中國因素的選舉效應，以及未來的可能影響。

（一）仍不明確的階級投票

以上統計分析先對階級影響做詳細的統計檢定，顯示階級組別基本上對總統大選的投票行爲沒有明顯作用。只有小企業雇主達到一定的統計顯著 (p=0.098, RRR=0.34)：小企業雇主相對於勞工階級而言，支持馬吳的機率是支持蔡蘇的 0.34 倍。除此之外，其他階級組別都不顯著。理論上，在兩岸經貿自由化過程中，勞工階級可能是主要利益受損者之一，因此他們的投票行爲便可能傾向於反對促成 ECFA 的國

民黨（政府）及其候選人。然而，將訪問調查資料進行統計分析後，並不支持階級政治或有階級選民浮現的說法。同樣的，透過統計檢定階級對九二共識的支持程度，也沒有顯著的預測效果。[12]

基於幾個因素，我們對本研究結果的推論，仍有若干保留。第一，對於「階級」或「階級位置」的界定，本文採取的分類架構是折衷方法，考量台灣特殊的政治經濟結構後，結合新韋伯主義 EGP 模型與新馬克思主義分類法 (Wright 1985: 2005)，而訂出 7 類階級位置。鄭盛隆 (2004) 採取的是新韋伯主義 Erikson-Goldthorpe 的分類架構 (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92)；林宗弘與胡克威則「採取簡化的新馬克思主義分類法，將台灣民眾的階級位置分爲雇主、自營作業者（含農民）、非技術工人與新中產階級（合併了技術工人或專家、經理人與專業經理人等三類），以及非勞動力。」(2011: 108)；而胡克威等人 (2010) 則採取新韋伯派最簡化的 5 大類。不同的階級分類，可能導致統計模型顯著水準的差異。第二，本研究只是一次性調查結果，相關問題需要更細緻的調查設計（如實施縱時性訪調）來予以檢證。

在決定受訪者投票行爲的變項中，我們的研究發現，仍以政黨認同爲最主要變數；不過，中國因素的作用在近年已成選民的關注重點。我們檢定 3 個有關中國因素的變項，其中兩個在統計上非常顯著。在傳統模型（模型 2）中，考量相對支持率（RRR 值）的顯著水準，自變項的重要性依次爲：政黨認同、省籍、國家認同（統獨）。但在模型 3 加入中國因素後，自變項的重要性依次爲：政黨認同、「九二共識」、省籍、「擔心失業」。由此顯示，「對九二共識態度」與「兩岸經濟關係下擔不擔心失業」兩個變項，是預測此次總統大選投票行爲的重要變項，尤其受訪者對「九二共識」的態度，在我

12 除了分析 CIS 2012 年的調查資料，我們也分析了 CIS 2013 年的資料。兩次調查都詢問民眾對九二共識的態度，我們用多元邏輯迴歸檢測「九二共識」與階級的關聯，其中以「不支持九二共識者」為比較基準，「支持九二共識者」和「對九二共識態度不確定者」為個別分組的依變項。統計發現，如以表 5 模型 3 中主要變項進行預測，不論 2012 年或 2013 年的調查，階級對支持九二共識與否，都沒有顯著預測效果。詳細統計數值請見本文附錄 2。

們的模型中，預測力僅次於政黨認同。

最重要的，我們發現一個令人訝異的統計結果：當控制中國因素後，傳統上扮演關鍵角色的國家認同（即統獨選擇），在統計上變得不顯著。初步推論是：中國因素在這次總統大選中，某種程度，似乎足以「取代」以國家認同變項對選舉行爲的預測。

如何解讀這個現象呢？

（二）九二共識與統獨選擇的關係

首先，我們在前文指出，過去十幾年來，台灣選民關於國家認同的總體變化趨勢是選擇「中間立場者」略有增加，選擇統一者減少，而選擇獨立者則在顯著成長一段時間後，趨於平穩。那麼，國家認同與中國因素中的「九二共識」變項之間，呈現什麼關係呢？

表 6 顯示，對九二共識採取支持態度者中，29.8% 是堅決統一者，20.6% 是堅決獨立者，49.7% 是中間立場者。相較下，對九二共識採取不支持態度者中，3.6% 是堅決統一者，74.4% 是堅決獨立者，22.0% 是中間立場者。而對九二共識採取不確定態度者裏，9.3% 是堅決統一者，44.0% 是堅決獨立者，46.7% 是中間立場者。這組數據顯示，支持九二共識者當中，除了堅決統一者，中間立場者也占了相當大比例。反觀不支持九二共識這個群組，主要來自堅決獨立者，中間立場

表 6：統獨立場與九二共識態度之交叉分析

	對九二共識態度									
	不支持		不確定		支持		不知道		總計（列）	
	N=	**%**	**N=**	**%**	**N=**	**%**	**N=**	**%**	**N=**	**%**
堅決統一	6	3.6	41	9.3	84	29.8	23	15.8	***154***	***14.9***
堅決獨立	125	74.4	193	44.0	58	20.6	64	43.8	***440***	***42.5***
中間立場者	37	22.0	205	46.7	140	49.7	59	40.4	***441***	***42.6***
總計（行）	***168***	***100.0***	***439***	***100.0***	***282***	***100.0***	***146***	***100.0***	**1,035**	**100.0**

* 大多數為拒答；Pearson chi2（6）= 159.9788, Pr = 0.000。

者相對少很多。但值得注意的是，堅決獨立者中，有相當多數對九二共識乃採取不確定的態度。對照堅決統一者絕大多數支持九二共識，堅決獨立者則是大多數對九二共識態度不確定。此處分析結果顯示，在國家認同立場上，堅決統一者與支持九二共識高度相關；而堅決獨立者對九二共識的態度，則主要分布於不確定與不支持。這項訊息可以佐證爲何在上述模型 3 ，國家認同對投票行爲的預測解釋力大幅縮減，而中國因素卻凸顯出來。可以這麼說：國家認同的作用某種程度被中國因素中和了 (neutralized)。

（三）變遷中統獨概念的意指

隨著中國因素在台灣的能見度愈來愈高、中國對台灣的影響力愈來愈大，同樣的統獨問卷調查的用語，受訪者在其主觀思惟中，可能已經摻入對中國因素的考量。換言之，當受訪者回答關於統獨問題時，答案中包含對中國（大陸）的態度與反應。例如，「統一」意味著與對岸的中國大陸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合併成一個國家；「獨立」意味著台灣應該追求國際上的國家地位、或法理上的獨立地位。這時候，統獨問題所指涉的內涵，已經從台灣「內部議題」，逐漸轉移到處理與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的「外部議題」。在台灣啓動自由化與民主化之前（1980 年代中後期），當時「統獨爭議」主要是內向性的問題，端指是否「推翻」或「保存」中華民國體制。在台灣啓動民主化、而且中國因素具體影響台灣政治之後（1990 年代中後期以來），「統獨爭議」已經轉化爲外部性的問題，指向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包括政治與經濟關係。

因此，同一組問卷問題，經過時間推移，其「意指」(signified) 可能已經產生變化。晚近的統獨問題，也許已經涵攝了部分中國因素的成分（包括對兩岸政治關係的評估）。所以，當我們在傳統模型中另外加入中國因素變項進行檢定，統獨選擇（亦即國家認同）的統計顯著度下降，表示原來模型中統獨議題涵攝的「中國因素成分」被中國因素變項「萃取」出來。因爲之前的傳統模型，並未檢測中國因素變

項；而這類傳統模型中的統獨議題可能涵攝了「中國因素的成分」，卻一直沒有被偵測、或納進問卷中加以偵測。同一組問題，受訪者在不同時期對它有不同解讀，可能反映了「意指」的變遷，除了上述的統獨議題的內外部性質，也反映了台灣整體公共意見氛圍的改變，包括受訪者對「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維持現狀」等詞彙的複雜理解與懸殊評價。[13] 從此角度，或許值得學界思考，二十多年來關於統獨議題的問卷題目，是否需要有所釐清或修改？

（四）浮現中的生計概念

我們不妨換個角度詮釋：台灣的政治現實 (political reality) 很可能在晚近發生了轉變，就是統獨因素對投票行爲的影響力確實已經下降；而中國因素的影響力則逐漸上揚。如果說國家認同（統獨選擇）所測量的是選民對一個政治共同體「在情感上的聯繫」，接近吳乃德論文中所稱的「愛情」問題；那麼，「對九二共識態度」與「兩岸經濟關係下擔不擔心失業」等中國因素變項所測量的，比較接近選民對台灣與一個政治關係曖昧不明「鄰居」的互動可能帶來利害衝擊的評估，接近吳乃德論文中提到的「麵包」效應。「九二共識」屬於選民對總體層面之兩岸政經關係的評估，而「擔不擔心失業」則屬於個體層次經濟利益關係的評估。

隨著中國崛起以及兩岸經貿關係的緊密化，在 2012 年總統選舉中，對台灣選舉政治所產生的作用，可以有幾個詮釋步驟：

(1) 「愛情關係」（即統獨選擇）被中和掉，而「麵包效應」則漸次浮現與放大。

(2) 「愛情關係」是否被「麵包效應」排擠？在統計模型控制「九二共識」和「擔不擔心失業」等中國因素變項後，統獨變項的作用變得不顯著。

---

13 耿曙等人的論文指出，在深度訪談中，「維持現狀」這個詞彙在不同受訪者間，出現南轅北轍的理解 (2009: 19) 。

(3) 因此：中國因素似乎成爲比（統獨）國家認同更有用的預測變數 (predictor)，這意味未來的總統選舉，在兩岸關係成爲選舉議題前提下，候選人將必須面對中國因素相關議題的壓力。

在深入詮釋的過程，我們考慮到，國家認同（統獨選擇）可能是比較純粹的「政治概念」；而「對九二共識的態度」則帶有較濃厚的「生計概念」。在預測台灣總統選舉的投票行爲上，政黨認同雖仍是最重要變項，但在控制政黨認同後，我們發現「生計概念」可能正在逐漸取代「政治概念」。

這裏提到的「生計概念可能正在逐漸取代政治概念」的說法，需要同時考慮民眾做出選擇的時機 (timing) 與動機 (motive) 的互動。在總統選舉年，民眾因爲選舉動員而思考「支持或不支持九二共識」與「兩岸經貿關係倒退」的關係，部分民眾可能因擔憂「兩岸關係倒退」，進而影響其經濟利益，而投票給「支持九二共識」的候選人；此時，九二共識在選民的思惟中，便具有生計的意涵。而在非選舉年，當民眾沒有暴露在選舉動員氛圍，不需立即面對選舉抉擇，「九二共識」與「兩岸經貿關係倒退」的聯想程度可能降低。當我們用多元邏輯迴歸檢測 2012 選舉年與 2013 非選舉年之「九二共識」與人口變項、經濟因素、政黨認同、和統獨立場的關聯，其中以「不支持九二共識者」爲比較基準，「支持九二共識者」和「九二共識態度不確定者」爲另兩個分組的依變項。在選舉年，「選舉動員」效果清晰，其中政黨認同以及與兩岸關係有關的家庭經濟因素和對失業的擔憂，都相當顯著。而在非選舉年，「去動員效應」也很明確，兩者的相關性相對降低（見附錄 2）。

可以說，在 2012 選舉年，當九二共識議題成爲爭取總統連任的國民黨的競選主軸，而在中國因素推波助瀾，以及許多財團負責人出面支持九二共識等情形下，「生計問題」（「兩岸關係對家庭經濟是否有幫助？」）被特別凸顯出來，而成爲民眾是否支持九二共識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但在總統大選一年後的調查，同樣對受訪者提問是否支持九二共識，「生計問題」與「政黨認同」等因素多少都「冷

卻」或「和緩」下來，不像選舉年那麼充滿戲劇性與「極化作用」。

在 2012 年 1 月台灣總統選舉投票前幾週，出面力挺「九二共識」者皆爲大企業集團負責人（都是跟中國市場有關聯的企業），而非文化界人士，大概就是「九二共識」做爲「生計概念」的顯現：被兩岸經貿關係「綁住」的企業界人士向選民喊話，提醒（或暗示）兩岸經貿關係已經有多麼緊密，一旦「兩岸經貿關係倒退」將有何種影響。

結果，「九二共識」的內涵究竟爲何，兩岸（國共）之間對「九二共識」界定的歧義，在這樣的脈絡中，反而相對顯得不重要。難怪某位召開記者會支持「九二共識」的企業家，說她並不清楚「九二共識」的內涵：「有沒有九二共識，或九二共識的具體內容是什麼，是政治人物與學者範疇。」（工商時報 2012）一個反事實 (counterfactual) 假設是，這次總統選舉，如果沒有大眾傳播媒體密集報導「九二共識」，如果沒有企業財團負責人出面支持「九二共識」，選舉的結果還是一樣嗎？假定選舉結果真的有差異，則表示「九二共識」的宣傳，確實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選舉結果。由於我們在研究資料上的限制，無法精確檢測這類問題，但這個提問在方法論上是有意義的，也可幫助未來在研究設計上更精進。

六、結論

本文從 2012 年總統選舉期間的政治活動與選舉結果出發，探問中國因素對台灣國家認同的影響。我們發現「九二共識」等中國因素變項，對國家認同變項似乎有中和的作用，並對這個統計發現給予初步詮釋。台灣在過去 20 年，一直被認爲是國家認同分歧的社會，此認同分歧，是否因爲中國因素的介入，而產生根本性的變遷？本文尚無法對此問題作出決定性的解答。但是，我們的統計分析結果，似乎支持以下的陳述：對中國因素評估的分歧，在某些政治議題及全國性選舉中，可能正在取代台灣內部的統獨分歧。從另外一個角度看，統獨分歧的「選舉效果」，相對於中國因素立場的分歧，重要性可能愈

來愈低。

從理論文獻的角度，觀察台灣選民在中國因素效應下的態度變化，台灣個案可以對外國（外部）力量影響國內（選舉）政治的現象，提出一個新的類型。北京對台灣總統選舉的介入，確切證實了經貿依賴結構作爲政治影響力槓桿的作用。北京通過「以商圍政」的策略，而諸多企業家對「九二共識」發表正面的支持態度，在投票前夕營造「兩岸需要穩定關係」的氛圍。而選民在目前兩岸關係下，對九二共識的態度與是否擔心失業，確實與他們的投票行爲高度相關。本研究發現的結果，即一個威權大國對其周邊的民主小國，宣稱對其擁有主權，並藉由經貿手段影響其選民的投票行爲，進而影響整體選舉的結果，是本論文對相關理論的一個貢獻。中國對台灣選舉的干預方式，不同於傳統上「西方國家」對第三世界的干預，也不同於後蘇聯時期俄羅斯對週邊國家的干預。從比較研究的角度，台灣個案對於香港與中國政治關係的互動，可以提出若干比較議題（吳介民 2014）。

此外，選舉研究的文獻中，有關「議題所有權」(issue ownership) 的理論也指出，由於選民對不同政黨與候選人擅長處理哪些議題存在既定印象，因此，政黨在競選活動中偏好聚焦自己擅長的議題，以便「占有」或「掌控」特定議題 (Petrocik 1996; Petrocik et al. 2003-2004)。因此，在 2012 總統選舉競選過程，國民黨主打「九二共識牌」，即在傳達一個訊息給選民，如果現有兩岸關係變動，將導致兩岸經濟關係的倒退，而影響民眾生計。此乃國民黨在傳統上掌控其對「經濟發展論述」的議題所有權。反觀民進黨，在總統選舉前夕，對國民黨主打「九二共識」採取消極反應，證諸前述民進黨競選幕僚的訪談，民進黨確實「不以兩岸政策做爲攻擊議題，而是被動接招。」而一些選民從支持蔡英文轉而支持馬英九，「其中一個主要因素是對兩岸經貿關係倒退的憂慮。」[14] 這表示「九二共識」議題的主控權不在民進黨的掌控範圍。綜合本文的研究發現，以及學者針對 2012 年

14 訪談來源同註 1。

中國因素影響選民投票行爲的分析，國民黨以「九二共識」做爲選舉文宣動員策略，佐證特定政黨策略操作「議題所有權」，確實爲他們的候選人帶來某些正面效果。

在中國因素效應下，台灣選民態度正在變動，但變動的方向不只一個；無論如何，這是兩岸關係與台灣政治現實發生鉅變的某種徵候。在此變遷過程，我們尚未確定階級（階級政治）與投票行爲有顯著相關；但證實中國因素與投票抉擇之間，有明顯關聯。

根據本文的發現，我們或可推論：因爲中國因素而產生的國家認同中的「生計概念」，在台灣的總統選舉政治中將持續存在相當一段時間。在未來的兩岸關係互動中，九二共識可能因爲種種原因而退出「論述舞台」，並失去其指標性的影響力，但是「中國因素」仍將持續尋找它的「論述」與「代理指標」，持續在台灣的選舉政治中產生作用。

我們在研究過程，推論得出的「生計概念可能正在逐漸取代政治概念」，也需要放置在近年來兩岸關係變動的脈絡中持續密切觀察。2013-2014 年間的「反服貿——太陽花佔領運動」，反映了公民社會與青年政治世代的興起，也讓公民團體成爲兩岸關係中的行動者。2014 年 11 月的「九合一」地方選舉，國民黨嚴重挫敗，極可能與「太陽花效應」相關。這一系列事件，是否代表「生計概念可能正在逐漸取代政治概念」的假設，無法適用於年輕世代？年輕世代是否正在重塑一種新的「政治概念」？我們期待未來持續探究這些問題，能夠提供明確的答案。

附錄 1

關於統獨議題的問卷調查，傳統的「一題式問法」大致如下：「關於台灣和大陸的關係，這張卡片上有幾種不同的看法：(1) 儘快統一；(2) 儘快獨立；(3) 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4) 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5) 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獨立或統一；(6) 永遠維持現狀。請問您比較偏向哪一種？」（TEDS 問卷）。本文採取的「兩題式問法」，在吳乃德論文 (1993; 2005) 發展出來的架構上做分析。爲了方便說明，請見下表。根據 two by two 表格，吳乃德將四類態度命名爲 (1) 台灣民族主義；(2) 現實主義；(3) 保守主義；(4) 中國民族主義。我們則將這四種態度「命名爲」(1) 堅決獨立者；(2) 機會主義者；(3) 維持現狀者；(4) 堅決統一者。表格中括弧內爲吳乃德論文的命名。爲了簡化分析，我們把 (2) 與 (3) 編碼成一組，稱爲「中間立場者」，並且以這組做爲統計分析的「參考組」（請參見本文表 6）。我們採取這樣的命名與分類，基於三個考量：第一，統計分析上的清晰與可操作性；第二，與問卷題意吻合；第三，論文的旨趣試圖瞭解，人們的統獨選擇如何與其他態度互動或關聯，而影響其總統選舉的投票抉擇。

<table>
<tr><td colspan="2" rowspan="2"></td><td colspan="2">有人說：「如果中國大陸在經濟政治各方面的發展和台灣差不多，兩岸就應該統一。」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td></tr>
<tr><td>同意</td><td>不同意</td></tr>
<tr><td rowspan="2">有人說：「如果台灣宣布獨立不會引起戰爭的話，台灣就應該宣布獨立。」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td><td>同意</td><td>(2) 機會主義者（現實主義）</td><td>(1) 堅決獨立者（臺灣民族主義）</td></tr>
<tr><td>不同意</td><td>(4) 堅決統一者（中國民族主義）</td><td>(3) 維持現狀者（保守主義）</td></tr>
</table>

附錄 2：解釋變項對九二共識的相對支持率（RRR 值）比較
（依變項的比較基準是「不支持九二共識者」）[a)]

	2012（選舉年）	2013（非選舉年）
依變項：支持九二共識者		
階級		
軍公教	0.66	1.14
資本雇主	3.90	1.21
小企業雇主	2.79	0.53
專業者與管理階級	1.08	1.01
自僱者	0.61	0.74
農民	1.09	1.97
非勞動力	**2.14+**	1.24
政黨認同		
泛藍認同	**16.55 *****	**2.75 *****
泛綠認同	**0.08 *****	**0.26 *****
統獨選擇		
堅決統一	**3.66 ***	**2.29 ***
堅決獨立	**0.25 *****	**0.53 *****
省籍		
外省人	**3.35 ***	**2.11 ***
女性	**1.94 ***	**1.38 +**
年齡	0.99	1.01
中國因素		
擔心失業	0.62	**0.65 ***
有助家庭經濟	**42.20 *****	**2.78 *****
沒影響家庭經濟	**6.74 *****	1.48
依變項：對九二共識態度不確定者		
階級		
軍公教	0.71	0.88
資本雇主	4.36	1.07
小企業雇主	2.87	0.65
專業者與管理階級	1.77	1.01
自僱者	0.65	1.04
農民	0.83	**3.83 ***
非勞動力	1.03	1.14
政黨認同		
泛藍認同	**3.70 ****	0.95
泛綠認同	**0.44 *****	**0.36 *****
統獨選擇		
堅決統一	1.56	1.22
堅決獨立	**0.33 *****	**0.68 +**
省籍		
外省人	1.86	**1.86 +**
女性	**2.85 *****	**2.89 *****
年齡	**0.95 *****	0.99

中國因素		
擔心失業	0.83	1.06
有助家庭經濟	**8.81** ***	**2.17** **
沒影響家庭經濟	**2.92** ***	**2.19** **
N=	889	960
Pseudo R-squared	0.367	0.216
Log likelihood	-578.19	-785.41

[a] 此處階級以勞工為參考組。其他各變項的參考組分別是：在政黨認同是獨立選民，統獨選擇是中間立場者，省籍是閩南人，教育為國中以下。本模型也控制年齡和收入；兩者均為連續變項。而與中國因素相關的兩個變項，其參考組分別是不擔心失業與認為對家庭經濟有負面影響者。由於收入與教育程度在模型中均不顯著，在本表沒有列出。

統計顯著水準：+ p≤0.1, * p≤0.05, ** p≤0.01, *** p≤0.001。

誌謝詞：作者們感謝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CIS 小組同仁們的合作調查，以及廖卿樺的研究協助；感謝黃長玲、陶儀芬、俞振華等人的評論與建議，以及兩位匿名評審與《台灣社會學》編委會的仔細閱讀與修改建議。

參考文獻

工商時報，2012，〈王雪紅挺馬挺九二共識〉，1 月 14 日（https://tw.news.yahoo.com/%E7%8E%8B%E9%9B%AA%E7%B4%85%E6%8C%BA%E9%A6%AC%E6% 8C % BA % E4% B9% 9D % E4% BA % 8C % E5% 85% B1% E8% AD % 98-213000497.html，取用日期：2012 年 2 月 16 日）。

中央社，2010，〈李亞飛談「九二共識」口徑未變〉，8 月 11 日（http://news.cts.com.tw/cna/international/201008/201008110538024.html，取用日期：2012 年 2 月 16 日）。

中央社，2015，〈朱立倫：兩岸同屬一中內涵定義不同〉，5 月 4 日（http://www.cna.com.tw/news/acn/201505040143-1.aspx，取用日期：2015 年 5 月 5 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鑑》（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瀏覽日期：2015 年 6 月 20 日）。

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總體資料統計庫》（http://statdb.dgbas.gov.tw/pxweb/dialog/statfile9L.asp，瀏覽日期：2015 年 5 月 22 日）。

王甫昌，1998，〈族群意識、民族主義與政黨支持：1990 年代台灣的族群政治〉。《台灣社會學研究》2: 1-45。

吳乃德，1993，〈國家認同與政黨支持〉。《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74: 33-61。

——，1999，〈家庭社會化和意識型態：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世代差異〉。《台灣社會學研究》3: 53-85。

——，2002，〈認同衝突和政治信任：現階段台灣族群政治的核心難題〉。《台灣社會學》4: 75-118。

——，2005，〈愛情與麵包：初探台灣民眾民族認同的變動〉。《台灣政治學刊》9 (2): 5-39。

吳介民，2009，〈中國因素與台灣民主〉。《思想》11: 141-157。

——，2012，《第三種中國想像》。台北：左岸。

——，2014，〈「中國因素」氣旋下的台港公民抵抗運動〉。頁 130-144，收錄於謝政諭、高橋伸夫、黃英哲編，《東亞地區的合作與和平》。台北：前衛。

——，2015，〈『太陽花運動』への道—台湾市民社会の中国要因に対する抵抗〉。《日本台湾学会報》17。

吳重禮、許文賓，2003，〈誰是政黨認同者與獨立選民？——以 2001 年台灣地區選民政黨認同的決定因素爲例〉。《政治科學論叢》18: 101-140。

沈筱綺，2010，〈故土與家園：探索「外省人」國家認同的兩個內涵〉。頁 111-146，收錄於張茂桂主編，《國家與認同：一些外省人的觀點》。台北：群學。

林宗弘、胡克威，2011，〈愛恨 ECFA：兩岸貿易與台灣的階級政治〉。《思與言》49 (3): 95-134。

林濁水，2012，〈數字說話：九二共識不是大選關鍵〉，自由時報，2 月 14 日（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560643，取用日期：2012 年 2 月 16 日）。

林繼文，2014，〈我怎麼投，看你怎麼說：條件式統獨偏好對 2012 年台灣總統選舉的影響〉。發表於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主辦「國家認同：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二十三次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2014 年 12 月 5 日。

洪財隆，2011，〈ECFA 的爭議脈絡與自由化進程之探索：以「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做爲分析視角〉。《思與言》49 (3): 9-54。

胡克威，2010，〈階級政治的復興？台灣的民主轉型與階級投票，1992-2004〉。發表於「2010 年度台灣社會學會研討會」，新北市新莊：輔仁大學：台灣社會學會，2010 年 12 月 4 日至 12 月 5 日。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2012，《本地生產總值統計特刊（2012 年）》（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10300032012XXXXB0100.pdf，取用日期：2015 年 6 月 20 日）。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2014，《2014 年香港統計年刊》（http://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140_tc.jsp?productCode=B1010003，瀏覽日期：2015 年 6 月 20 日）。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2015，《香港統計資料》（http://www.censtatd.gov.hk/home.html，取用日期：2015 年 6 月 20 日）。

時殷弘，2015，〈習近平外交大戰略漸成型〉，紐約時報中文網，1 月 20 日（http://cn.nytimes.com/china/20150120/cc20shiyinhong/zh-hant/，取用日期：2015 年 2 月 1 日）。

耿曙、劉嘉薇、陳陸輝，2009，〈打破維持現狀的迷思：台灣民眾統獨抉擇中理念與務實的兩難〉。《台灣政治學刊》13 (2): 3-56。

張茂桂、吳忻怡，1997，〈教育對於統獨傾向的作用〉。《台灣政治學刊》2: 107-189。

張傳賢、黃紀，2011，〈政黨競爭與台灣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間的聯結〉。《台灣政治學刊》15 (1): 3-71。

盛杏湲，2002，〈統獨議題與台灣選民的投票行爲：1990 年代的分析〉。《選舉研究》9 (1): 41-80。

盛杏湲、陳義彥，2003，〈政治分歧與政黨競爭：2001 年立法委員選舉的分析〉。《選舉研究》10 (1): 7-40。

陳文俊，2003，〈藍與綠——台灣選民的政治意識型態初探〉。《選舉研究》10 (1): 41-80。

陳陸輝、周應龍，2004，〈台灣民眾統獨立場的持續與變遷〉。《東亞研究》35 (2): 143-86。

陳陸輝、耿曙、王德育，2009，〈兩岸關係與 2008 年台灣總統大選：認同、利益、威脅與選民投票取向〉。《選舉研究》16 (2): 1-22。

陳義彥、陳陸輝，2003，〈模稜兩可的態度還是不確定的未來：台灣民眾統獨觀的解析〉。《中國大陸研究》46 (5): 1-20。

湯晏甄，2013，〈「兩岸關係因素」真的影響了 2012 年的台灣總統大選嗎？〉《台灣民主季刊》10 (3): 91-130。

童振源、洪耀南，2012，〈兩岸關係經濟化對總統大選的影響〉，NOWnews.com 今日新聞網，4 月 4 日（http://news.cts.com.tw/nownews/politics/201204/201204040973066.html，取用日期：2012 年 4 月 10 日）。

楊婉瑩、劉嘉薇，2009，〈探討統獨態度的性別差異：和平戰爭與發展利益的觀點〉，《選舉研究》16 (1): 37-66。

鄭夙芬，2009，〈族群、認同與總統選舉投票抉擇〉。《選舉研究》16 (2): 23-49。

鄭盛隆，2004，《台灣的階級投票研究：1992-2001》。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蕭怡靖，2009，〈「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之政黨認同測量的探討〉。《選舉研究》16 (1): 67-93。

蘋果日報，2015，〈習：沒九二共識兩岸就沒和平〉，5 月 5 日（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50505/36531867/，取用日期：2015 年 5 月 6 日）。

Hirschman, Albert O., 1980[1945], *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rt, Robert J., 2010,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ise of China: Implications for the Long Haul.”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25 (3): 359-391.

Bader, Julia, Jorn Gravingholt and Antje Kastner, 2010, “Would Autocracies Promote Autocracy? A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on Regime-Type Export in Regional Neighbourhoods.” *Contemporary Politics* 16 (1): 81-100.

Bergman, Manfred Max and Dominique Joye, 2005, “Comparing Social Stratification

Schemata: CAMSIS, CSP-CH, Goldthorpe, ISCO-88, Treiman, and Wright," *Cambridge Studies in Social Research* 10. Cambridge: SSRG Publications.

Breen, Richard, 2005, "Foundations of a Neo-Weberian Class Analysis." Pp.31-50 in *Approaches to Class Analysis*, edited by Eric Olin Wri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ush, Richard, 2013, *Uncharted Strait: The Future of China-Taiwan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Copeland, Dale, 1996,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A Theory of Trade Expect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 (4): 5-41.

Fatton, Robert Jr., 2002, *Haiti's Predatory Republic: The Unending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Boulder: Lynne Rienner.

Friedberg, Aaron L., 2011,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Ikenberry, G John., 2008,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87 (1): 23-37.

Jackson, Nicole, 2010, "The Role of External Factors in Advancing Non-Liberal Democratic Forms of Political Rule: A Case Study of Russia's Influence on Central Asian regimes." *Contemporary Politics* 16: 101-118.

Kelley, Judith G., 2012, "International Influences on Elections in New Multiparty State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5: 203-220.

Keohane, Robert O. and Joseph S. Nye, 1977,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Khamzayeva, Anar A., 2012, *Resilience of Authoritarianism and Its Projection on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Case of Russia*.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LUISS Guido Carli, Italy.

Knorr, Klaus and Frank Trager, eds., 1977, *Economic Issues and National Security*. Lawrence, Kan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Leininger, Julia, 2010, "'Bringing the Outside in': Illustrations from Haiti and Mali for the Re-Conceptualization of Democracy Promotion." *Contemporary Politics* 16 (1): 63-80.

Moon, Bruce E., 1985, "Consensus or Compliance? Foreign-Policy Change and External Depende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9: 297-329.

Morrow, James, 1999, "How Could Trade Affect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6 (4): 481-489.

Palmer, Alan Warwick, 2010, *The Lands Between: A 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 1815-1968*. New York: Faber and Faber.

Petrocik, John R., 1996, "Issue Ownership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with a 1980 Case Stud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0 (3): 825-850.

Petrocik, John R., Benoit, William L. and Hansen, Glenn J. 2003-2004, "Issue Ownership and Presidential Campaigning, 1952-2000."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18 (4): 599-626.

Richardson, Neil and Charles Kegley Jr., 1980, "Trade Dependence and Foreign Policy Compliance: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4 (2): 191-222.

Rigger, Shelly, 2006, *Taiwan's Rising Rationalism: Generations, Politics, and "Taiwanese Nationalism."* Washington DC: The East-West Center.

Roeder, Philip G., 1985, "The Ties That Bind: Aid, Trade, and Political Compliance in Soviet-Third World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9 (2): 191-216.

Roessler, Philip G., 2005, "Donor-Induced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Privatization of State Violence in Kenya and Rwanda." *Comparative Politics* 37 (2): 207-227.

Snyder, Scott, 2009, *China's Rise and the Two Koreas: Politics, Economics, Security*.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Subramanian, Arvind, 2011, "The Inevitable Superpower: Why China's Dominance Is a Sure Thing." *Foreign Affairs* 90 (5): 66-78.

Tung, Chen-yuan, 2003, "Cross-Strait Economic Relations: China's Leverage and Taiwan's Vulnerability." *Issues & Studies* 39 (3): 137-175.

Wagner, R. Harrison, 1988,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Bargaining Power,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2 (3): 461-483.

Wright, Erik Olin, 1985, *Classes*. London: Verso.

——, 2005, "Foundations of a Neo-Marxist Class Analysis." Pp. 4-30 in *Approaches to Class Analysis*, edited by Eric Olin Wri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right, Theodore Paul, 1964, *American Support for Free Elections Abroad*. Washington, DC: Public Affairs Press.